

9月16日,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袁毅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袁毅平的摄影代表作有《东方红》《振我国威》《拔地擎天》《70年代村干部》《马路“天使”》等,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杰出摄影活动家”。他始终坚持用摄影歌颂时代、记录历史,许多作品已成为珍贵的文献。



摄影家袁毅平： 用镜头留下中国视觉档案



《五一劳动节》

捕捉时代与人的双重存在

袁毅平1926年10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市沙洲县鹿苑镇。他1939年始在上海百乐摄影室从事人像摄影,后在《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任摄影记者;参与筹办了《大众摄影》杂志并任编辑组长,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

从布衣到专家,从摄影创作到理论,袁毅平引领影响了多个年龄段千千万万的摄影人。

1950年至1970年末,袁毅平以一种职业摄影的意识和习惯,拍摄了很多他所经历的社会活动。在他的柜子里面躺了四五十年牛皮纸袋中,是各种规格的底片和小样。他对这个时期的底片基本上都整理过,底片袋上有标记,还有照片上留下来的剪裁划线。这些影像的主要内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的面貌和天安门的大型活动,有反映西南地区生产建设与生活场景的,也有在中国摄影学会工作时拍摄的作品,如江苏水乡劳作的人们、河北涿鹿农村人的生活……这些题材本身在中国的视觉档案中是缺失的,是陌生的。

袁毅平敏锐地捕捉到时代与人的双重存在,人们面容朴素,透露出简单而发自内心的情怀。他的照片带给我们一种陌生感,这个陌生感包括那个时代人的面貌和情感的陌生感,也包括我们熟悉的关于过去的影像。他的照片画面影调明快、新鲜,画面建构结实,在视觉上具有很强的审美性。

为拍《东方红》等了两年多

《东方红》是袁毅平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一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开始曲之前,反复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给袁毅平带来了灵感。从那天开始,他每天清晨都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等候最美的日出,反复研究拍摄角度和曝光度,寻找最美的拍摄瞬间。

1961年的一天清晨4点多,袁毅平从梦中醒来,走出家门,发现天空微微泛红。他赶忙骑车前往天安门广场,看到满天红色霞光,这正是他理想中想要的画面。袁毅平迅速选择了最佳角度,举起相机,频频按下快门,连续拍摄了11张天安门广场的日出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东方红》。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如此评价《东方红》:“万道朝霞,气势辉煌的天空与庄严、稳

定的天安门建筑相互呼应,形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象征。以记录性为主的这一作品,具备了史诗般的审美价值。”

在长达五十年的创作中,袁毅平在特定时期对于天安门的记录已将“天安门”这一象征符号与中国的历史节点牢牢地嵌在了一起:五十年代的五一劳动节及天安门广场扩建,六十年代的“东方朝霞”,七十年代悼念毛泽东的肃穆广场,还有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的天安门城楼。作为建筑,天安门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老去;而作为符号,它留存于袁毅平的影像中,静默地等待今人的重新解读。

摄影文化交流的使者

1966年春,阿尔巴尼亚向我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派摄影师去帮助拍摄一套反映他们国家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和风土人情的照片,作为向其他国家宣传和文化交流之用。

当时中国摄影学会派袁毅平等三人前去帮助拍摄。阿方很重视此事,最高领导人霍查、谢胡先后亲自接见了袁毅平等三人。拍摄原打算两个星期结束,后来时间不断延长,从1966年4月28日开始一共拍了将近一个半月。袁毅平等6月6日回国,他们所拍摄的资料经过遴选,为阿尔巴尼亚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影展。同时,中方放大了十二套展览照片,以此表示两国亲密友好。

袁毅平还留下了大量记录江南风情的摄影作品,如经典《水乡秋收》系列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半个多世纪前江南人独特的衣着、劳动的场面和秀美的水乡风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毅平走遍了大江南北,拍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片段和点滴。这些照片并无宏大叙事背景支撑,但几乎每一张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小故事,都能勾连出一段往事。袁毅平所在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更加频繁地与其他国家的摄影机构或组织开展联系活动,同时加强与港澳台地区区间的摄影文化交流,他将视线和照相机镜头伸向了超越自己日常经验之外的“他方”。



《水乡秋收》



《田间休息》

当代摄影多棱镜

在文艺评论家吴强看来,“清新自然”是袁毅平摄影作品的突出风格,他的人物摄影,强调抓取人物自然流露的典型瞬间;他的生活摄影追求真情实感;他拍风光,要求具有特定的意境,崇尚自然。

袁毅平的摄影理论充满中国特色,摄影作品同样表现出独特的风格。有人评价袁毅平:具体地把意境论、传神论以及象征、气韵等传统美学范畴、概念运用在摄影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他的摄影歌颂时代、记录历史,是传承时代精髓之作。

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袁毅平具有多重身份:摄影师、编辑、摄影理论研究者、中国摄协的领导者、摄影活动组织者。这多重身份使他的影像如多棱镜一般折射出了摄影题材、风格与时代的关系,探索了主流影像与突破影像规范的可能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将会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摄影演进的线索。

(本报综合)



《东方红》